

65252/3826

0134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初探

李君如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我们研究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任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总思路或总构想。这一思想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50年代中期已有思想萌芽，60年代初露端倪，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的思想与实践是前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基本思路与基本原则。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具有观念形态、制度结构形态与道路(实现途径)形态三个层次：首先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观念；其次是一种在生产力结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上具有革新特点的制度结构；再次是一条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来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构想，内在地包含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哲学上具有“求实”与“辩证”两个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下篇”的正确构想；扬弃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同时，回答了当前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具有时代的新意。它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南，必定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稳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来，为在中国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奋斗，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新构想。深入地研究与阐发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与推进它的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地研究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工作神圣的任务。

总构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但是他的总思路或总构想，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1920~1926年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自此以后，他长期来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的形成，自5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了一系列准备与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50年代中期)，思想萌芽阶段。当时他参与了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要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其代表作是1956年11月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1957年4月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等重要讲话。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文中，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朋友提出的“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这一问题时，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决定好了，还需要党员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他强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①邓小平同志突出这一点，不仅仅是给外国朋友讲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而且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而言的。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文中，他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主要的任务已转向“搞建设”，另一方面指出“建设中暴露出的严重缺点，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他告诫人们，1956年我们做的事情中，“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他提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二、面对群众的需要。”^②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强调党要接受监督，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因此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他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应该接受党内、党外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从实际出发搞好社会主义建设。^③在这些重要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在5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萌芽。

第二阶段(60年代初期),初露端倪阶段。在总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从体制上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思想,并且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1962年7月7日,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大胆地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④这一“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农业生产发展问题的思想,已经把“从实际出发”的哲学原则推进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比50年代中期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是邓小平同志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思想。在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具体组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还提出国营工业企业既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又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观点;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观点;企业的技术工作由总工程师负全责的观点;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的观点;等等。诸如此类的讲话与文件,使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同志在60年代初期对于从中国特点出发搞社会主义,已经有一些体制上的具体设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想,在那时已经初露端倪。

第三阶段(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思想前奏阶段。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看到“四人帮”篡权的野心以及人民群众的不满,多次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且让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对中国的问题比以往认识得更为清楚,有步骤地在军队、工业、农业、教育和文艺等各个领域,提出了“整顿”的问题。这些“整顿”,直接的对象是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秩序问题,但又不局限于此。他在整顿中强调要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同他以后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这是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的深刻认识。他所说的整顿,具有结构重组与改革的意义。比如在1975年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谈话中,他讲了七个问题:(1)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2)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3)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4)整顿企业管理秩序;(5)抓好产品质量;(6)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7)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要讲物质鼓励。^⑤这些思想正是后来提出改革开放问题的前奏。当时根据邓小平同志一系列讲话精神,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还提出:归根到底,我们要以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真干革命与假干革命、真干社会主义与假干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同志1975年的思想及其实践,对于他日后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形成阶段。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及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以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为基础,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原则,形成了这一理论的“轮廓”。1978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2年9月1日在党的十二大所致的开幕词,以及这以后的许多重要讲话,是

他最终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志。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报告先后对这一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社会主义思想，做过概括；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进一步对邓小平同志这一社会主义思想做了概括与阐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12条原则。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应用、检验和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考察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我们注意到他的基本思路及其提出的基本原则，具有互相联系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思想观念上，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观念。它既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过去“左”倾的或急于求成的观念相决裂，又同以“激进改革”名义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根本对立。它是既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又具有开放性特征的，以发展现代化生产力为中心，把富强、文明、民主融为一体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念。

第二层次是作为制度结构形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制度结构形态上，它是一种革新的社会主义。首先，在生产力结构中，邓小平同志坚持以现代化的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现代化生产力的结构中又主张以科技现代化作为整个物质生产现代化的关键，把知识分子看作现代化依靠的中坚力量。这些主张为以工业化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了现代的意义。其次，在经济制度中，邓小平同志主张从我国生产力落后与不平衡的现实出发，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结构。这种“主体”社会主义即具有多样性特点的社会主义。“主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多样”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应用的灵活性。根据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要求，他根据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强调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提出计划要和市场相结合，形成了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方式的新构想。再次，在政治制度中，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要反对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与家长制影响，扩大民主；同时他多次指出要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他反复强调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相统一的政治目标，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的这些理论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承继并坚持它的同时，又进一步研究了它的不完善方面，强调必须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可以说，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完善、保障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他革新社会主义旧体制的重要构想。同时，在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中，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党的革命传统，同时又强调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解放人们的思想。形成具有科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最后，在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些制度结构上的特点，表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革新的社会主义。

第三层次是作为道路（实现途径）形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实现上述具有革新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条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道路或实现途径：一是在观念上通过不断解放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在行为上通过

改革与开放，实现机制转换，搞活社会主义的道路；三是在控制与操作上通过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由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与道路等多重形态综合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邓小平同志对于这一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建构，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贡献。

哲学特征：求实与辩证

在接见外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我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⑥确实，“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的根本特征。当邓小平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时，这既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认识与解释，又是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种说明。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是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的科学结论。

进一步的考察可以使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构想，内在包含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具有两个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是求实。

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求实，摆脱任何形式的空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从观念的形成来看，还是从理论的内容来看，都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的求实精神。首先，对原有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求实的。邓小平同志多次告诫人们：“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⑦“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⑧因此他同意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新概念来概括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论断似乎比过去大大地后退了一步，因此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但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并能客观地观察问题的人，都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完全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政治与思想道德标准。承认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不够格”，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种求实的唯物主义的 attitude。“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就是承认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次，对我国国情的认识是求实的。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强调我国已经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指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生产力落后、封建专制主义与小生产思想影响很大等特点，这种分析是客观的、求实的，为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念提供了真实的国情根据。再次，对世界主题的认识是求实的。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也是客观的，他认为当代世界的问题即东西南北问题，东西方之间的新特点是和平，南北方之间的问题是发展，因而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正是鉴于这一认识，他作出了通过改革与开放来实现现代化的决策。又再次，对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战略构想也是求实的。邓小平同志反对任何形式的急于求成思想，形成了他关于中国经济“分三步走”的求实的发展战略。最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设计是求实的。邓小平同志经过一系列科学的分析，既改革旧体制的弊端，又反对改革中出现的不切实际的“全盘西化”倾向，形成了具有求实特征的社会主义观念、制度与道路的新构想。

二是辩证。

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内在地包容了辩证法的精神。早在 50 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肯定过邓小平同志关于“要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④在他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中，他的一系列设计或论断从表面上看来似乎都是对立的，然而它们都是辩证的对立，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比如他强调，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既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又要加强理想与道德教育；既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做到共同富裕；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实行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改革开放；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又要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既要对外开放，又要自力更生；既要发展商品经济，又要完善计划经济；既要效益，又要公平；既要大胆，又要稳步；既要稳定，又要搞活；等等，等等。这一对对矛盾，都属于互补类型的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只有在相互协调平衡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对它们倚重倚轻或顾此失彼，就要离开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中出现失误。

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过程，既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在初始条件比较落后的国度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的矛盾展开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担负了领导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遇到挑战，一方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又必须从国情与世情出发，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任务，甚至要发展一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既要从实际出发去考虑问题，又必须掌握辩证法的艺术，妥善地处理与协调好客观存在的各种复杂矛盾。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我们要掌握这种求实精神与辩证精神，必须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理论价值：毛泽东思想的“下篇”

江泽民同志不久前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把心思用在这里，经过实践，集思广益，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做好。

这篇“大文章”的理论价值在哪里呢？

第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下篇”的正确构想。

我们都知道，70年前，一代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炮声的引导下，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接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情的深入考察与缜密研究，指出中国革命只有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把搞好这两个革命称为写好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与毛泽东同志的精力就是放在如何写好“上篇”文章上。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新民主主义论》的问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

出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上篇”文章是一篇优秀的社会科学论文。

“上篇”文章的成功，既为写好“下篇”文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如何写好“下篇”文章提出了许多难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曾经成功地运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经验、阶级分析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党的领导的经验等等，找到了以“和平赎买”为形式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形成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由于党与毛泽东同志过去的精力主要用在领导民主革命上，对于第二步革命即如何搞社会主义，从思想到理论都缺乏充分的准备。当年在论述“两步走”时，仅仅注意到民主革命在中国具有自己的特点，而没有来得及论述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在初期与中期的指导上虽然十分出色，但在后期则过快过急，过于简单划一，力图向苏联的模式靠拢。其实，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主义革命必定要求社会主义革命也具有中国的特点。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只能在一个生产力落后与不平衡、自然经济小生产仍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毛泽东同志曾经注意过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有意识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建成”两个概念，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⑩他同时还说过，只有当现代化的工业与农业建立起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⑪这说明，他当时对于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历史文献告诉我们，他曾经很乐观地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前八年是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⑫但是实践告诉我们，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尽管我们做了不少的有益探索，我们党仍然没有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王国，1960年至1962年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论及这一问题，指出我们在搞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仍处在必然王国之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正是中国革命“下篇”文章的难点。毛泽东同志终其一生，没能完成这个“下篇”文章。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本身，由于它体现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精神，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含义，因而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革命“下篇”文章的主题。“上篇”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下篇”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整篇文章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起来，克服了原来“两步走”的理论中“第一步”有个性、“第二步”缺乏个性的不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价值就在于它提出了中国革命“第二步”实践的新的理论构想，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有两个基本的构成部分，上篇是新民主主义论，下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邓小平同志为写好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下篇”文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扬弃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对于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长期来处子探索的过程之中。作为一个勇敢的探索者，毛泽东同志有失误，也有成功。毛泽东同志成功的经验中有不足，失误的过程中也有合理的因

素。对于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实践及其思想，绝不能简单地加以抛弃或漫画式地加以丑化，而要科学地加以研究。邓小平同志不仅一贯主张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科学地对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扬弃。如果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提出的哲学根据，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那么，这一命题提出经验基础，就是毛泽东同志自50年代中期以来探索社会主义规律时积累的丰富经验。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双双提前完成。正当全国人民欢庆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却看到了社会主义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的文章。他说十大关系即中国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时遇到的十对矛盾，其实，这十对矛盾归结起来就是一对矛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与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这篇文章在党内高层领导中产生了很大的振动。为了统一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在所讲的10个问题中，第三个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会后，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开始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要追溯到1956年。

从那时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行过三次比较切合实际的探索：第一次是1956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前。当时提出的要通过发展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允许地方与国营企业搞一点“独立王国”的思想，兼顾国家、生产单位与个人三者利益的思想，允许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点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思想，共产党要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科学与艺术领域要实行“双百方针”的思想，要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思想，等等，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与经验基础。这一次探索中途夭折后，我们在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上搞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走了一段弯路。第二次探索是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这一时期通过纠正“共产风”等“空想”、错误，重新回到中国的现实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提出了我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点，要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论点，要坚持按劳分配的论点，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论点，等等。其中不少论点对于后来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可惜，这一次探索又脱轨转向，在庐山会议后期演变成一场所谓“反右倾”的斗争。第三次探索是1960年底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关于要认识社会主义必然王国，减少盲目性的思想；关于要扩大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要退到生产小队的思想；以及在《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条例中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珍贵的思想财富。邓小平同志自始至终是这三次探索的参加者，这些探索提供的丰富经验以及探索中断的深刻教训，他都了解。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构想，就是以这些经验教训为基础，经过他的科学扬弃之后，建构起来的。作为一个有党性的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在毛与邓之间制造矛盾，而应该科学地研究两个历史伟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实践的历史条件，认识到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回答了时代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挑战，为它增添了具有时代性的新内容。

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立足于中国国情(历史与现实)，而且立

足于当代世界之情，具有时代的新意。首先，他正确地抓住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特点，并从这一特点出发做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动态的开放社会；其次，他敏锐地注意到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并大胆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成功的管理经验与体制引入社会主义的体制与机制之中，进行了“嫁接”性的改革；再次，他突出强调新技术革命对我们的挑战，提出了以科技现代化为关键、以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的社会主义新构想；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持久相持阶段的特点，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最后，他强调在以和平与发展为特点的国际环境中，防止“和平演变”，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长期任务。这一些主张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决不是有些国外学者所曲解的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邓小平同志面对着时代的挑战，勇敢地面对现实，既吸收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一切进步的成果，又抵制对世界进步潮流的一切反动，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时代的内容，推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第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南，保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发展。

理论来自实践，又将指导实践。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了从曲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很快就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渴望全党能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是为了在“实事”中“求是”，形成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今天，我们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但主题已经明确、原则已经确定、轮廓已经形成，而且经过了10年实践的检验，因此我们既有信心凭藉进一步的实践完善这一科学的理论，也有信心在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推进这一崭新的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写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意义深远的“大文章”，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计，大胆而又稳步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

注：

①②③④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46~247、第250~256、258~259、第305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31页。

⑥⑦ 《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1987年2月~7月)》第7、23页。

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

⑨⑩⑪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374、462页。

⑫ 毛泽东：《十年总结》。